中国国际扶贫中心
IPRCC International Poverty Reduction Center in China

研究报告

2010年第9期（总第9期）

增长与减贫发展合作

增长与减贫发展合作[1]

目 录

1. 前言：发展是一个学习和变革的过程
2. 发展合作与中国的增长和减贫
   2.1 中国本土战略
   2.2 国际合作作为资金和知识的来源
   2.3 中国管理发展合作的要素
   2.4 可供非洲借鉴的相关经验
3. 非洲增长与减贫中的发展合作
   3.1 哪些合作在非洲产生了效应
   3.2 中国对非发展合作战略
   3.3 非洲人和捐助国观点
4. 政策选择

专栏 1：国际对华援助的数量与分布
专栏 2：中国对非发展合作的估算：官方发展援助（ODA）与其他官方资金流（OOF）

附录
图1：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扶贫对比
图2：中国从农业经济向基本工业化经济的转变
图3：中国的体制改革：从基于本土的次优体制向现代体制的转变
图4：OECD发展援助委员会(DAC)成员国向非洲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ODA）的总量

[1] 2009 年 10 月 28-29 日，中国 -DAC 研究小组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增长与减贫发展合作研讨会，本报告为该活动的综述性文件。来自中国、非洲和各捐助机构的 130 名代表参加了此次国际研讨会。本报告由中国-DAC研究小组研究协调员王燕博士执笔写作。作者感谢吴忠，黄承伟，李晓云、Richard Carey、Philip Karp、Michael Laird 的支持与鼓励，感谢中国 -DAC 研究小组成员和参会发言人与评论人提出的想法、意见和建议。会议文件和发言请见：http://www.iprcc.org.cn/front/article/catalog.action?id=175

摘　要

随着人们已日益意识到发展合作在提高援助效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各方对进一步了解中国与其捐助国的合作的经验与教训产生了更为浓厚的兴趣，尤其是中国如何在吸收外部支持与意见的同时，依然在选择自己独特发展路径时保持自身独立性。而另一备受关注的问题则是国际援助如何在社会、文化和政治等方面与中国内部发展日程实现统一与结合。上述问题对主要依靠国际援助的非洲国家而言具有关键意义。

尽管中国非洲在各自当前的民族、地理、社会经济和地缘政治情况上具有显著差异，但从历史上看，双方仍具有一定相似之处。1978 年，当改革开放拉开帷幕时，中国还是一个以农业为国家最大经济部门的低收入国家，农民占国家总就业人口的 71%。经过了三十年的学习与转变，中国如今已成为劳动密集型制成品的最大出口国，以自身经历展现了低收入国家发展的可实现性。因此，中国为非洲各国提供了一个鼓舞人心的范例。

回顾中非过去三十年的发展情况，“增长与减贫发展合作会议”与会者认为，中国的发展经验具有可信性，且进一步的经验交流还可带来更大收获。发展，尤其是经济转型，是一个充满不确定因素的过程。因此，国家应通过以学习、选择性采纳和创新为基础的方法来实现自身发展。

在中国的发展经验中，非洲国家可主要关注以下三项内容：

1. 中国的发展是一个内生主导型的发展模式，在该模式下，国家政府和人民完全掌握自身发展的方向和进程。作为一个“发展驱动型国”(developmental state)，中国的政治领导人和政府将经济发展作为国家当务之急，并践行其所做承诺。以实行内部问责制来确保政府政策取得效果。中国快速的大规模发展主要受内部因素的驱动。通过分享知识、引进新的方法、先进技术和经验，国际发展合作伙伴和外国投资商加快了中国的发展进程。

2. 中国的发展模式亦是一个学习和创新型的模式。在内部因素驱动下，该务实型发展途径以“干中学”和反复试验的学习方式为基础。中国从较简单的改革入手，之后逐步实行更为复杂的改革。在改革过程中不断发现确认各种增长瓶颈的同时，勇于试点，积累成功经验，放弃失败的试点项目。发展合作伙伴在中国的学习和变革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支持作用。

3. 中国的发展途径是独特的，其发展的次序可为他国所借鉴。改革首先从农业和乡镇企业开始，之后转移至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和出口领域。对贸易和外商投资的渐进型开放使中国得以在各个发展阶段发现并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但是，中国的发展过程远非完美，且并未完成。当前，中国还需调整增长模式，从依靠出口转变为扩大内需，并实现以人为本的和谐、可持续性增长。

中国对非洲经济参与的加深受到了非洲参会人员的普遍欢迎。他们认为，中国的援助、贸易和投资有助于推动非洲的发展和减贫工作。然而，中国如能进一步利用和学习自身在管理发展援助方面的丰富经验，以指导本国参与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的援助政策，援非工作便能够做得更好。

提高发展援助的有效性和避免重复犯错符合各方利益。依据《巴黎宣言》和《阿克拉行动日程》进行的当前改革，旨在通过完善协调机制，提高援助的透明度与预见性来提高援助的有效性。目前，在捐助国提供的软件和中国的硬件之间存在一种潜在互补性，亦即一种潜在的“三赢”方案。国际社会在协调发展合作活动和改革多边援助机制上作出了一系列努力，而中国在此方面的更多参与将受到国际社会的欢迎，同时展示中国成为一名负责任的全球合作伙伴的意愿。

合作关系的建立要求合作各方对新思维和各种合作方式持开放态度。现有捐助国可以向中国学习，反之亦然。例如，现有捐助方项目执行单位（PIU）的重复设立损害了非洲多国的公共行政体系，而此种做法在中国则受到禁止。捐助国可从项目执行的速度和效率，以及将援助、贸易和投资有效结合等方面向中国取经，而中国则可加强对其项目的监督、评价和影响评估工作，学习过去成功经验，吸取失败教训。此外，援助的“条件性”(conditionality)和“受援国主导”(ownership)之间的关系应得到进一步讨论和研究。

如非洲国家希望同中国一样拥有更为充分的控制权，则还需实现更高水平的自主和问责。为达此目标，非洲国家需进行人力和体制能力建设，以界定、领导自身的发展进程并实施自己的计划。此外，非洲各国还可通过对捐助国进行指导，更加有效地控制自己的发展路径。可帮助非洲国家实现上述目标的其他措施还包括：使非洲国家掌握更加全面的中国发展合作的数据（援助的水平和条件），使他们了解中国及其跨国公司在非洲所进行的（在政府支持之下的）商业性交易的条件。

不断增强的非洲经济一体化亦对促进非洲大陆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更强的非洲领导力则有助于非洲国家制定基础设施发展的跨国跨区域战略，从而更好地利用中国及现存捐助国提供的各种机会。

世界上饥饿贫困的人民再也无力承担无效援助产生的严重后果。因此，国际社会还需共同努力，以应对减少贫困、消除饥饿和促进增长等一系列重大挑战，以及在气候变化和流行性疾病等因素影响下而变得更为严峻的问题。中国的发展经历告诉我们，非洲本土人才可作出更多努力，将自身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国际社会欢迎并支持非洲国家在发展进程中发挥更加强大的领导作用和自主能力，从而通过更加强有力的增长和减贫国际合作，以建设一个更加和平和繁荣的世界。

一、前言：发展是一个学习和变革的过程

众所周知，发展是一个充满不确定因素的过程，而经济转型更是如此。由于这种不确定性，发展本身应建立在学习、选择性采用和创新的基础之上。三十年前改革开始之际，缺乏一个改革的蓝图，中国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无人知晓改革的具体路径，同样也没有人预料到，在 1978 年市场经济改革开始的三十年后，中国保持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高效率的减贫。用新的国际贫困线（1.25 美元 / 天，2005 购买力平价）来计算，自 1981 年以来的 24 年中，逾 6.3 亿中国人实现脱贫，贫困人口比例从 84% 下降至 16%（Chen 和 Ravallion 2008）（附件 1 图 1）。

三十年前，中国还是一个以农业为最大经济部门的低收入国家，农民占全国总就业人口的 71%。与许多非洲国家类似，中国的自然资源相对丰富，非技术性劳工较多，缺少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中国通过出口如原煤、原油、矿产和农产品等原材料创收外汇。到 1985 年，原油出口仍占总出口额的20%。三十年来，中国近乎了完成三大转型：a）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b）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c）从封闭型经济向基本与世界接轨的开放型经济的转型。此历史转型可体现在以下有关三大部门就业结构的数据上（附件 1 图 2）。

中国在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减少贫困和应对危机等方面取得的成就自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虽然中国的改革主要为内部导向型，但其发展合作伙伴在上述过程中发挥了促进作用。此外，中国近年来已加强了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合作，尤其是与非洲国家的合作，这一点可从贸易投资的迅速增长以及发展合作的不断扩大中得到体现。已为各方广泛认同的一点是，中国的参与有助于为非洲创造新的增长和减贫机遇，并为非洲人民提供新的理念和投资来源。通过分享利益相关方（包括非洲国家、捐助国和新兴国家）建立各种发展合作关系的经验，将上述机遇最大化，并在此发展过程中吸取经验教训。以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为共同目的，参与支持非洲发展的各方均可从相互学习中受益，建立一个更为紧密的合作构架。

在上述大背景下，中国–DAC 研究小组及时举办了其首次活动，即“旨在增长与减贫的发展合作”国际研讨会。因篇幅有限，本文将不可能对此作全面介绍，而主要关注会议讨论的下列三大关键问题：

1. 中国通过哪些战略和方法实现快速发展和减贫？中国如何从自身的发展合作中吸取经验，并将之应用于促进增长和减贫？这些经验教训在多大程度上与非洲相关？（第二部分）

2. 哪类发展合作在非洲起到了实际效用？新兴捐助国（如中国）采取了怎样的合作途径？（第三部分）

3. 非洲、中国与现有捐助国如何携手努力在非洲构建新的发展合作关系？（第四部分）

二、发展合作与中国增长和减贫

2.1 源于本土的大规模增长减贫的战略[2]

中国改革议程的确立主要受到了追赶发达国家内部强烈意愿的驱动，以及实现由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发展目标的鼓舞。在路径依赖因素的影响下，中国的发展目标是通过不断实验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意识形态的独立帮助中国确立了其在自身发展议程中的领导和决定地位。作为一个面临着巨大不确定性的转型经济体，中国制定了一种独有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路线，使贫困人口也得以参与、推动和受益于国家经济的增长。虽然“最终模式”可能与市场经济类似，但就中国而言，此种独特的发展路径使中国得以维持社会稳定、国家安全、自信、保持了吸引外国援助和直接投资的良好投资环境。在某种程度上，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成为了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

中国从较为简单的改革入手，依靠本土的次优体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HRS）以及乡镇企业（TVEs）发展、和通过设立经济特区（SEZs）实现贸易体制的渐进改革，在早期利用价格双轨机制逐步放开价格政策，使本国经济向世界经济开放。直到晚些时候，中国才开展了一系列更为复杂的变革：财政改革（1994）和金融改革（2000 年之后）。“摸着石头过河”成为了中国经济改革的特色。这种渐进的、从实践中学习的创新发展方式也使众多企业和机构得以实现结构调整，开展新的创业，从而使私有经济的发展超过了国有经济（附件 1 图 3）。据此，中国的发展可大体分为以下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本土化改革和经济自由化（20 世纪 80 年代）。引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价格改革、乡镇企业飞速发展和经济特区的建立。

第二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经济增长、体制转型和发展成本（社会和环境成本）的外化，主要使城镇地区受益，收入差距开始扩大。

第三阶段（21 世纪头十年）：加强体制现代化，使国家法律法规与WTO和其他国际标准接轨，重新平衡增长模式以应对中国快速发展引起的社会和环境后果（Gransow 和 Zhou 2009）。

战略 1：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及其对减贫的巨大影响。1978 年底，安徽省凤阳县自发开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集体农业的过程。为解决缺粮问题，农民们开始实施将集体土地承包给各家各户的政策（Du 2006）。虽然此举一开始并不合法，但到 1980 年，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施率已达到 45%，而到 1983 年则上升至 98%（Lin 和 Wang 2008）。这一转变的最大启示是，政策可对人民自发行为进行采纳。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以及农产品价格的提高是 1978–84 年间农村改革的关键因素，提高了农民积极性，实现了农业生产力的快速增长和减贫。农村总减贫量的近一半便是在此改革初期实现（Lin 1987 1992；Ravallion 和 Chen 2007）。

战略 2：乡镇企业：脱离农业，而非脱离农村。乡镇企业在 1971 年的人民公社体制下就开始出现。农业部门在 1980 年后的高速发展创造了剩余劳动力，

[2] 为满足广大发展实践工作者的要求，本节着重介绍与非洲发展中国家有关的中国经验，忽略那些不甚相关的方面，强调其独特性和针对性。

也提高了国民储蓄，从而为乡镇企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机遇。1979 年开始的财政分权为地方政府通过支持乡镇企业发展地方经济提供了新的动力。乡镇企业雇佣劳动力从 1978 年的 2800 万上升至 1988 年的 9500 万（SSB 2007）。乡镇企业的发展带动了农村收入的提高，以及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部门的转移。乡镇企业和其他非国有企业的蓬勃发展为国有企业带来了压力，并刺激了国有企业的重组。企业之间以及国有和非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同样有助于提高国有企业生产力。非国有企业的发展显著改善了资源的不合理分配，而非国有企业的技术结构也与中国的相对优势更为契合。

战略 3：设立经济特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创造就业机会。1979 年，中国开始设立经济特区。此举使中国极大地脱离了传统的社会主义做法，使中国得以逐渐开放其贸易和投资机制，发挥本国的比较优势。正是在 1992 年春天邓小平南巡之后，外商直接投资开始大量涌入中国。90 年代初，上海设立了浦东特区，1992/93 年间有 18 个新特区获批，来自欧洲和北美的外商直接投资迅猛增长。自 2003 年以来，中国已成为了世界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目的地国。城乡人口流动政策逐渐宽松，使 1.5 亿—2 亿农民工在的沿海地区寻得工作。劳动力的加剧流动使资源配置更为有效，从而实现了生产力的提高、包容性增长、减贫和福利的改善（Lin 和 Wang 2008）。

战略 4：基础设施和地区发展投资。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一直遵循着对农村基础设施进行广泛投资的经济发展政策，尤其是对运输、交通、能源、通讯和供水部门的投资。1997/98 年亚洲金融危机使中国通过财政刺激和西部开发战略加大了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西部开发战略旨在加快中国西部和中部省份的发展。10 年间，中国的公路里程从 1998 年的 4700 公里提高至 50000 公里，大型集装箱港口规模也已扩大。其他大型项目还包括拉萨至格尔木铁路的建设（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组成部分）、南水北调工程和高速铁路的建设。

战略 5：努力构建国内国际和谐社会。经济增长的某些负面影响突显，如收入差距的扩大、环境恶化和外部失衡，已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第四代领导集体提出了名为“科学发展观”的新型发展道路（Hu 2004）。2004 年，政府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其中包括一系列新的政策措施，以废除某些具有偏向城市居民的政策。例如：a）取消农业税；b）提高政府对农业、农民和农村的支出；c）改善农村社会服务和低保体制；d）放松对城乡人口流动的限制，为农民工及其家庭提供社会服务。同时，一份关于中国和平发展的白皮书亦于 2005 年 12 月公布，可被视为“和谐社会”理念的补充内容。白皮书提到，中国的发展是对世界和平的贡献，也是一项创造和平世界、实现共同繁荣的战略。白皮书还强调了中国与其他国家实现互利发展的原则。“和谐世界，和谐中国”的理念由此诞生（Gransow 和 Zhou 2009）。

总而言之，中国的大规模经济增长和发展可归功于（1）政府强有力的主导以及对经济发展的坚定承诺；（2）对试验的偏好，包括试点和成功试验的增加；（3）开放的学习精神：首先发挥本土人民内生的创造力和创新力，之后向发展合作伙伴和外国投资商进行全国性的集体学习。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进程并未完成，因此，数名中国官员在会上指出，“中国的成功在于中国是一名好学生”，并暗示了中国还需继续学习以应对当前各种挑战。

2.2 国际援助作为减贫资金和知识的来源

中国以史为鉴（与前苏联的关系），坚持将自力更生视为发展之本。1960 至 1978 年间，中国并无国债或外债。1979 年，中国开始向 UNDP 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寻求发展援助。邓小平曾对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说过，不管有无外国发展援助，中国均能实现自身的发展，但国外援助能加速中国的发展进程（世界银行 2008）。这正体现了这一时期的对于外援的指导原则。正是这种自信的态度使得中国开始积极寻求获得双边和多边援助。日本政府于 1979 年为中国提供的贷款标志着双边援助的启动。

在近 30 年中，对外经济和发展合作在促进增长和减贫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直接作用体现在提供资金来源，间接作用体现在引进新的理念和国际最佳实践，推进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并加强实施能力。近些年来，相关政策建议和知识服务比资金供给更受欢迎。“外国援助给中国带来的最大益处在于新理念的引进、思想的解放和知识的传播。”（康炳建）。我们视国际发展伙伴为“老师”，他们在中国的发展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周弘）

尤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减贫战略很大程度上受到国际最佳实践的影响，这一影响体现在将工作重心从贫困地区转移到贫困家庭上。迅速减贫时期的特点是强调农村改革和加大农业政策支持力度。1974–84 年和 1994–96 年为两个代表性时期。在农村工作未得到充分重视的时期，减贫速度放缓，尤其是 1985–1993 年以及 1997–2002 年间。在以下四个时期，国际机构、捐助国通过不同渠道为中国的发展和减贫事业贡献力量。

1. 1979 – 1985 年，即农村改革时期，其标志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制度和经济特区制度等本土制度的出台，极大地解放了农户的生产力。当时外汇的缺乏制约了中国的发展。国际机构、捐助国主要通过提供资金和现代技术促进中国经济基础设施的发展。多边捐助机构和日本在中国的基础设施、能源和农业领域进行投资。云南鲁布革水电项目于 1984 年引进了国际竞争性招标（ICB）机制，引起了一轮“鲁布革冲击波”。（Lu 和 Wang 2004）

2. 1986 – 1993 年扶贫开发政策的实施对象为贫困区域，而非贫困家庭。通过贷款而非拨款的形式提供扶贫基金以加强生产能力建设。国务院扶贫办等机构成立。

3. 1994 – 2000 年（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八七计划”的目标是七年内（1994—2000 年）实现 8 千万绝对贫困人口的脱贫。到 2000 年，基本解决农村人口的温饱问题。与此同时，中国正经历着快速的体制改革，为加入WTO做准备。国际机构/捐助国在减贫、环境和社会发展方面提供了技术援助并进行了相关投资。1995 年至 2000 年间，中国国务院扶贫办投资 52.7 亿元用于减贫，而大部分资金是由中国的发展伙伴提供的。（Wang Guoliang 2005）。

4. 2001 – 2010 年（十年规划）：中国政府继续将工作重点放在贫困区域，努力解决农村地区的贫困问题。然而，2004 年于上海召开的全球大规模增进减贫成效大会促成了首次广泛的南–南经验交流，此后，贫困家庭受到了愈来愈多的关注。2009 年，国家设立了一项新的有益农村地区低收入人口的反贫困标准。同时，为“重新实现均衡发展”，更多的外国援助（60%—70%）被用于环境保护、污染治理、清洁能源、可再生资源、资源保护、卫生、文化和教育、气候变化、公共物品和高级政策咨询等领域。（详情由德国经济合作发展部、英国国际发展署、欧盟和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等机构代表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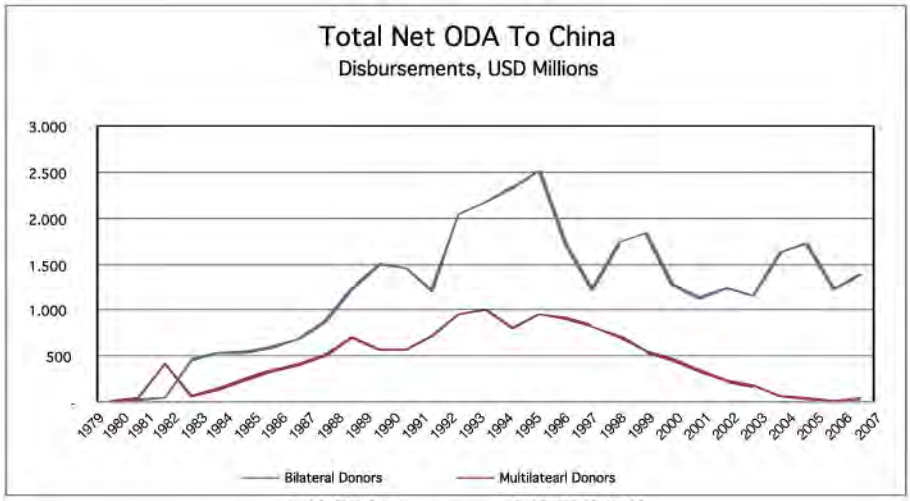
专栏 1 中国接受官方发展援助的金额与分布

何为援助? 根据 OECD 的定义，发展援助包括用于发展目的的赠款和优惠贷款（最少含有 25% 的赠与成分）。基于上述定义和 OECD 的统计数据，1979—2007 年间中国接受的官方发展援助（ODA）的净额（赠款 + 贷款减 – 还款）达 490 亿美元。其中包括 205 亿美元的赠款和 285 亿美元的（净）贷款。20 世纪 90 年代前半期，中国接受的官方发展援助总额持续增长；而在后半期和 21 世纪初期，对中国的官方发展援助净额分别呈下跌和再次回升的势头。

图 1 双边捐助国和多边捐助机构对华官方援助（ODA）（1979 – 2007）

对华官方援助 ODA 净额

支付额：百万美元



双边捐助国　　多边捐助机构

资料来源：根据OECD/DAC数据整理，不含不具备ODA资格的非优惠贷款。

中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NDRC）整理的相关数据表明，1979—2005 年间对华双边和多边贷款（包括部分不具备 ODA 资格的非优惠贷款）发放总额为 830 亿美元。迄今为止，日本为中国最大的双边捐助国，其对华贷款和赠款分别达到 200 亿美元和逾 60 亿美元。此外，日本还是第一批对华开始双边捐助的国家。德国是中国第二大双边捐助国，1985—2007 年间对华贷款和赠款分别为 42 亿美元和 34.4 亿美元。其他捐助国包括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英国、瑞士、澳大利亚、荷兰、比利时、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典、芬兰、丹麦、挪威、韩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俄罗斯、波兰和卢森堡等国（NDRC 2009）。

部门构成：半数以上的投资用于运输和能源部门。事实上，亚洲开发银行和日本约有 2/3 的贷款直接投放于上述部门。根据中国商务部（MOFCOM）的统计数据表明，过去三十年间的对华赠款总额达 66 亿美元以上，并主要用于以下部门：教育、环境、农村发展和扶贫、卫生、公共政策和体制改革等。（MOFCOM，2009 年 8 月）久而久之，对华外国援助的类别已从“硬件”转换成“软件”，受援地区的地理位置从东部转向西部，援助形式逐渐从赠款转变为更多的优惠和非优惠贷款。合作伙伴也从“政府对政府”模式转变成“多方对多方”模式，其中私营部门和非政府组织（NGOs）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一直致力于与私营部门和 NGOs 等主体的合作。

资料来源：Gransow和周弘，2009年，《中国和国际捐助国：中国发展管理分析》，中国—DAC研究小组背景文件，（第二部分）

2.3 中国成功管理和利用发展援助的要素

战略和原则。中国在接受和管理外国援助的问题上坚持“ 独立自主的原则：利用他人的经验实现自身的目标 ”。中国领导人坚信“ 没有任何人更了解这个国家 ”——捐助国无法获取“ 治理国家 ”的全面信息[3]。对于任一发展援助项目而言，政府既是发起人，又是信息提供者、共同投资人、担保人、谈判者和实施者（周弘）。“ 中国对各种理念进行了管理 ”并从中选出了符合本国国情的理念（I. Ohno）。中国政府在众多谈判中均坚持“ 国外建议和技术必须符合本国国情 ”的原则。多年来，中国与其捐助国始终保持平等的伙伴关系，在谈判中坚持“ 双方均需享有否决权。”（N. Hope）。在某些情况下，如多边机构对项目进行了否决，中国政府则会运用自己的财政资源以资助拟议中的项目。中国在发展议程方面强有力的主导力和所有权，值得非洲国家借鉴。

利用外国援助促进中国的全面发展。中国有效管理援助的条件之一是长期发展计划及其磋商过程的有效性。中国自改革初期就设立了一管理外国援助的制度安排。然而，最重要的是将外国援助和优惠贷款纳入五年发展计划的磋商过程中。第八个五年计划表明了利用外援的政策——“ 我们必须积极有效利用外资，力求获得更多多边机构和双边政府贷款，尤其是条件更为优惠的贷款 ”。中国还特别为多边机构和双边政府提供优先部门和项目列表，引导外国捐助机构的工作方向与五年计划保持一致。捐助项目的选择基于三大标准：a）必须符合中国的长期发展规划；b）必须符合中国的扶贫计划；c）必须因地制宜。外援计划和项目由此被充分纳入中国自身的发展规划及规划的执行过程中。

协调捐助国。在中国，政府在协调捐助国问题上往往起着主导作用。中国通过政府有效管理发展进程解决援助协调问题。在中国并不存在正式的捐助国团体。中国自改革伊始就建立了由商务部（前身为MOFTEC）主导的外国发展援助管理体系。在五年发展计划的制定过程中，规划机构率先与各部委和地区就发展需求进行协商，力求与国家的发展计划达成一致。向捐助方和投资方提供接受援助的“ 优先部门 ”的相关资料。随后，由 MOFCOM 发起与双边捐助国和一些多边机构的讨论。财政部则是世界银行、ADB 等多边财政机制和双边援助国（JICA）的窗口机构。此项举措的特点为“ 由中央政府进行集中协调，由省级和地方政府进行项目实施 ”。从中国的角度来说，这种对称机构或“ 窗口机构 ”制度可促进信息流通、减少协调捐助机构的交易成本和缓解机构能力不足。但从捐助国的角度而言，通过上述窗口机构协调各捐助方有时会面临重重困难，因各种原因造成的交易费用也相对较高，原因包括部门界限、既定的利益群体和一些部委的能力限制。（K. Leitner 和 R. Haas）。

学习和能力建设机构。中国发展了各类机构[4]以加强领导、实施能力：NDRC、MOFCOM、MOF 和 LGOP 分别新设了外资利用部门 / 中心，专门从事捐助国的协调和联合项目管理。中国进行有选择性的学习：“ 中国人只做他们真正想做的事 ”（N. Hope）。项目执行单位（或项目管理办公室，PMO）和项目经理发挥了捐助方和客户间重要的桥梁作用。政府部门认识到能力方面存在差距，专门成立了省级和县级“ 项目委员会和 PMOs，力求召集项目实施所需的人力资源。由于项目官员由老师、技术人员等拥有不同职业背

[3] 信息的不对称在发展援助和合作领域普遍存在。例如：委托代理问题以及反馈循环的中断。详情见 Martens，B. 等，2002 年，Svenson，2006 年和 Stiglitz，1989 年。

[4] 中国设有至少两套机构：一是有着上千年历史的政府行政体系；二是由中央、省级和地方多级构成的中国共产党（CCP）体系。（详见 Kenneth Lieberthal，2003 年，中国的治理）。本报告仅着重于讨论与发展中国家有关的政府机构。

景的人员构成，因此需每年对上述人员进行脱产[5]和在职培训，加深他们对新观点和国际惯例的了解（R.Hass）。许多受训后的项目经理被提拔为 LGOP、MOF 等政府机构的司局长、主任。此外，上述人员的工薪报酬保持与同行相当的水平，他们仍为“体系”内部成员而非受雇于捐助机构[6]。这种安排模式可确保稳定性，鼓励受训项目经理长期在本国制度体系下工作并获得提拔，从而减少类似非洲国家的人才外流现象。

共同出资机制和问责制。中国政府对各类发展项目均提供了不同比例和水平的联合融资。近些年来，一般而言，由省 / 市级政府提出项目建议，并承诺共同出资以及偿还贷款。然后由中央政府（NDRC）在项目提议寄至捐助机构前根据上述三大标准和国家工作重点对项目进行审批。就此而言，此类机制表明了省 / 市政府对上述项目的所有权及其相应的责任义务，包括项目的执行以及评估、贷款偿付和后续管理工作。如果项目执行情况良好，省/市级官员则有晋升的机会，反之，如果当地经济增长回落或发现存在贿赂行为[7]，官员则会被降职。该机制还明确了负责该项目建成后的日常运营、管理和维护的政府、部门。

总而言之，发展援助在中国发展和减贫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发展援助为新思想、新方法、新知识和经验开辟了途径，促进了可能受利益团体阻挠的、不易推动的体制改革，因而受到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普遍欢迎。但是，学习并不是免费的和轻而易举的。中国为学习支付了“学费”——建立必要机构、为外资企业（FIEs）和合资企业提供盈利良机，并接受如（将外援与捐助国贸易相连的）“捆绑性援助”（tied aid）等条件。19 世纪 80 年代以及 90 年代初期，50% 以上的对华双边援助为“捆绑性援助”（NDRC，2009 年）。即便如此，“捆绑性援助”仍使处于发展初期的中国受益匪浅。如：全套设备进口、统包工程提供了亟需的资金和先进技术。此外，中国还通过技术合作型“捆绑性援助”学习了相关专业知识、管理技巧、技术和体系。通过开发项目和项目管理官员的培训，发展援助还可提供培训和能力建设。曾经担任项目经理的梯队能力的改进实际体现了知识转让和能力开发的成效。

2.4 什么与非洲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相关？

尽管中国和非洲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但两国在历史上拥有相似之处。与会者同意中国的发展经验具有可信性，但还有诸多方面需要研究学习。

首先，中国的做法是一种实用（而非意识形态）的“集体学习”的模式，为进行试验和借鉴成功失败经验提供政策空间。所有国家可自由选择自身的发展模式和道路，但各国需要相互学习，探索和发现自身潜能。由于学习是一种需付出成本且痛苦的过程，因此中国这种愿意为学习支付费用和努力工作的做法值得非洲国家借鉴。

[5] 中国政府划拨巨资用于官员培训，设立了两套培训学校或培训中心，对象包括中央、省级和县级官员、主管部门官员和 CCP 高级官员。例如：第十一个五年计划规定，每年将有 500 名省级官员、8800 名司局、主任级官员和 10000 名县处级负责人接受培训。

[6] 根据此种安排模式，项目官员仍需对本国人民即委托人负责，因而减少了“委托代理问题”的产生。

[7] 中国有两套反腐机制：政府体制内的监察部和共产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CCDI）。根据 CCDI 报告，2009 年 1 月至 11 月期间，共有 106626 名官员受斥责，其中 85353 名官员受党纪处分，29218 名受行政处罚。在 CCDI 和监察部处理的案件中，包含 1001 例土地开发相关的渎职犯罪案件、2906 例官员商业贿赂案件、逾 10000 例违反环保法律案件、16 例重大工业事故案件和 3822 例 5 · 12 震后救灾物资挪用案件。（中国日报，2010 年 1 月 8 日，第 1 页）

第二，中国做法可作为一种“受援国主导”的模式，在该模式下，国家和人民可把握其发展道路。我们无法轻易复制中国模式，但中国选择的发展道路有其独特的特征和含义。一些人指出中国是一个追求发展的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中央政府在制定远景、路线图（发展规划）以及刺激增长和减贫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而地方政府由人民支持负责实施各项计划和项目。经济快速增长大部分受内在驱动影响，政府负责兑现其作出的承诺。外部力量发挥着重要的推动和催化作用。

第三，中国发展的先后次序值得参考：首先发展农业和乡镇企业，其次发展基础设施和制造业，然后着重社会保护、教育和医疗改革以及环境（D. Brautigam，2009年）。中国的做法是自下而上进行的，政府通常提倡试点，并为人民群众提出的成功做法提供政策空间（J.Wuttke）。在改革的早期，政府采取了地方上成功的做法，并将其推广，例如家庭承包制，乡镇企业和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诸城模式。财政分权为省级和地方政府提供了有效激励，有助于发展地方经济。中国的实用主义允许其借鉴国际经验，但不盲目照搬，力图修改国际经验使之适应中国的特殊国情。在检验一种新模式的适用性后，中国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和推广该模式。

在通过学习获得成功方面不乏先例。过去，日本、韩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都曾在不同时期接受外国援助，这些国家通过共享信息，首先向日本和其他发展合作伙伴学习，然后互相学习，最后不再需要国际援助。东亚（包括中国）经验的重要特征之一是通过有效的援助管理模式，将援助作为获得发展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的一种工具。而且，通过援助、贸易和投资，东亚国家加速其区域整合的进展，发展生产网络，并从这种区域合作关系中获益。（I.Ohno）

三、非洲增长与减贫中的发展合作

自1960 年以来，OECD 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提供近 6 千亿美元（2007 年价格）的官方发展援助(ODA)（见图 4，依据 OECD-DAC 数据）。对该援助的有效性曾展开一场激烈的辩论。数个发言人讨论了发展援助委员会、欧盟、美国和非洲国家间的发展合作关系。例如欧盟和非洲于 1959 年建立合作关系，并每五年对 EDF 协议进行更新。对非发展援助显著增长，并在恢复法律和秩序、尊重人权以及改善治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Cauwenburgh）。并非所有援助国和受援国对与非洲建立的合作关系现状表示满意（R.Haas），因此，国际社会正努力通过《巴黎有效援助宣言》（2005 年）和《阿克拉行动日程》（2008 年）等协议来提高援助的有效性。

非洲是一个充满潜在机遇的大陆。近年来中国加大了在非洲的发展合作和更广泛的经济参与。中国总理温家宝宣布——中国对非援助总额至 2009 年 9 月达到 760 亿元人民币，2008 年底各项贷款总额达到 460 亿元[8]。中非贸易的年平均增长率在过去八年超过 30%，并于 2008 年超过 1080 亿美元。中国对非投资获得稳步增长，2008 年对非洲大陆的直接投资达到 55 亿美元（Chen Deming，2009 年 11 月）。

本节讨论与非洲建立的各种发展合作关系、采取的方法，以及中国和现有捐赠者相互学习参与非洲事务的经验。

[8] 但这是累计数额，按部门、国家的配置和分解不可获取。依据《金融统计年鉴》，2006 年中国对外援助总额为 10 亿美元、2007 年达到 14.7 亿美元和 2008 年达到 18 亿美元。但该年鉴使用的定义不同于 OECD-DAC，因此数据来源不具直接可比性。（见表格 2）

3.1 哪些合作在非洲 产生了效应?

非洲人民在创造古代文明和国家独立方面独具匠心。近年来，15 个非洲国家实现了显著增长和减贫——一种非洲模式正在形成(Li Anshan，2009 年)。几位发言人总结了相关经验和教训。乌干达在 1993 年制定了脱贫战略后，15 年间取得了巨大成就，贫困发生率由 1992 年的 56% 下降至 2007 年的 30%。五项支柱有助于支持该战略——优先发展经济、良政管理、人类发展 ， 改善投资环境 ，促进私营部门发展。这些政策具有有效性，有助于为与发展合作伙伴包括中国扩大贸易和投资铺平道路 (Fred Omach)。

管理捐助国，案例1。在南非——一个克服了援助依赖性的中等收入国家，官方发展援助仅占政府预算的 1%。政府将援助视为带来创新理念、提高宏观和风险管理能力的工具。政府通过财政部 IDC 控制和决定优先事项，并管理着 30 个发展援助国 / 合作伙伴。建立了发展合作信息系统 (DCMS) 以增加发展合作的透明度。南非积极参与全球提高援助有效性和监控《巴黎宣言》成果的行动，并在制定《阿克拉行动日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Mokgadi Tena)。

管理捐助国，案例 2。类似地，埃塞俄比亚已获得拥有清晰领导远景的政策主导权，并建立了一个与发展合作伙伴开展合作的新框架——“ 利用援助以摆脱援助 ”。埃塞俄比亚选择了——“ 以农业发展为基础的工业化 ” 战略，分别联系各援助国，并按照各个捐助国的比较优势从不同捐助国处获得产业支持。政府主导发展合作关系，管理援助关系和政策内容。埃塞俄比亚和中国已建立长期双边关系——中国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而非援助国，引进了新的工作文化和道德规范 (Izumi Ohno)。

协调援助国。坦桑尼亚是五个东非国家之一，已成功建立成熟的合作关系。发展合作伙伴提供 30% 至 40% 的政府预算。在过去的几年中，政府已开始协调不同援助国开展活动，并建立一个数据库。在外援提供的支持中，约 37% 是预算支持，45% 用于支持不同项目，15% 用于多援助国 “ 菜篮子 ” 项目。对坦桑尼亚而言，管理和协调总额为 7-19 亿美元的国际援助为其政府的行政能力带来了沉重压力。在过去几年，全国有 900 至 1400 多个项目，导致协调工作难度加大。坦桑尼亚更倾向于接受更多的预算支持——现今 11 个双边和 3 个多边合作伙伴协调并提供预算支持。该模式允许受援国拥有主导权，对资金进行有效配置。(Judica Omari)

3.2 中国对非发展合作战略

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其人均收入低于所有 OECD 发展援助委员会 (DAC) 国家。根本上，中国在非洲开展的发展合作活动在本质上不同于 OECD-DAC 援助国提供的援助。中国将与非洲建立的发展合作关系视为家庭中贫困兄弟姐妹间 ” 穷帮穷 ” 的友好帮助。1840 年后，中非拥有相同的殖民地历史，但中国并未在任何国家开拓殖民地。中国遵循国家前总理周恩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制定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中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这些原则强调相互尊重、互利互惠以及不干涉内政。除遵循 “ 一个中国 ” 原则外，不对发展合作附加任何政治条件。

一些与会者认为指导中国对外援助的基本原则几乎不随时间变更。举个例子，1970 至 1975 年间建成的坦赞铁路连接赞比亚丰富的紫铜带，直至达累斯萨拉姆的海港（He Wenping，2009 年）。但中国与非洲开展合作的动机由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相互之间的政治支持转变为着重基于双方互补性的经济互利。依据每人不同的经验和优先发展事项，中国四代领导人对对外援助战略的转变作出了不同的重要贡献。早期领导人力图通过获得非洲支持在联合国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以便打破政治孤立。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原来的互相支持原则也已转变为基于市场原则的经济互补。

第二，中国发展合作旨在帮助非洲国家建立其自力更生和自我发展的生产能力。中国借鉴国内减贫项目方面的经验，更加注重提高贫困人口的生产能力而不是提供现金转移支付／补贴。依照“授人以渔”胜于“授人以鱼”这一中国千年传统，因此，中国在非洲农业发展合作项目着重建设小农场、农业商品加工厂和农业技术示范中心。

第三，中国快速增长大部分归功于向国际贸易开放。中国借鉴这一经验，将援助和贸易相结合，认为基于比较优势的贸易具有互惠性。一方面，中国的要素禀赋正在发生变化，其中最近获得的一个比较优势是善于以低成本建设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一些非洲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缺乏资本，熟练劳动力和项目管理者。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拥有不同的自然和要素禀赋，可以进行优势互补。另一方面，双边的比较优势发生冲突时（例如纺织品和服装），单靠自由贸易不能让双方平等获利。因此，发展合作应通过直接投资、培训和能力建设以着重进行技术转让。

第四，目前中国对“外援”尚没有与其官方数据相应的官方定义。中国的对外援助不同于OECD定义，包括发放赠款、无息贷款，优惠贷款，以及对合资企业或合作提供援助（Tian, 和 Gang 等人）。显而易见，中国政府正将援助、贸易和投资相结合以便对发展起到杠杆作用。在某些情况下，政府使用援助支持中国企业走向世界，拥有国际竞争力。商务部表示：“中国企业已发展壮大，并在广阔的非洲大陆取得了丰厚的利润”（Chen，2009 年）。建立了中非发展基金，使用政府资金投资中国在非企业的股权（被称为“政府资金，市场运作”）。

专栏 2：中国对非发展合作：官方发展援助 (ODA) 与其他官方资金流 (OOF)

本专栏阐明，中国在与非洲开展发展合作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但中非官方合作即 ODA 的数量不同于某些新闻报导所述情况。如果包括其他官方资金流 (OOF)，中国正成为与现有援助国美国和德国具有同等重要性的合作伙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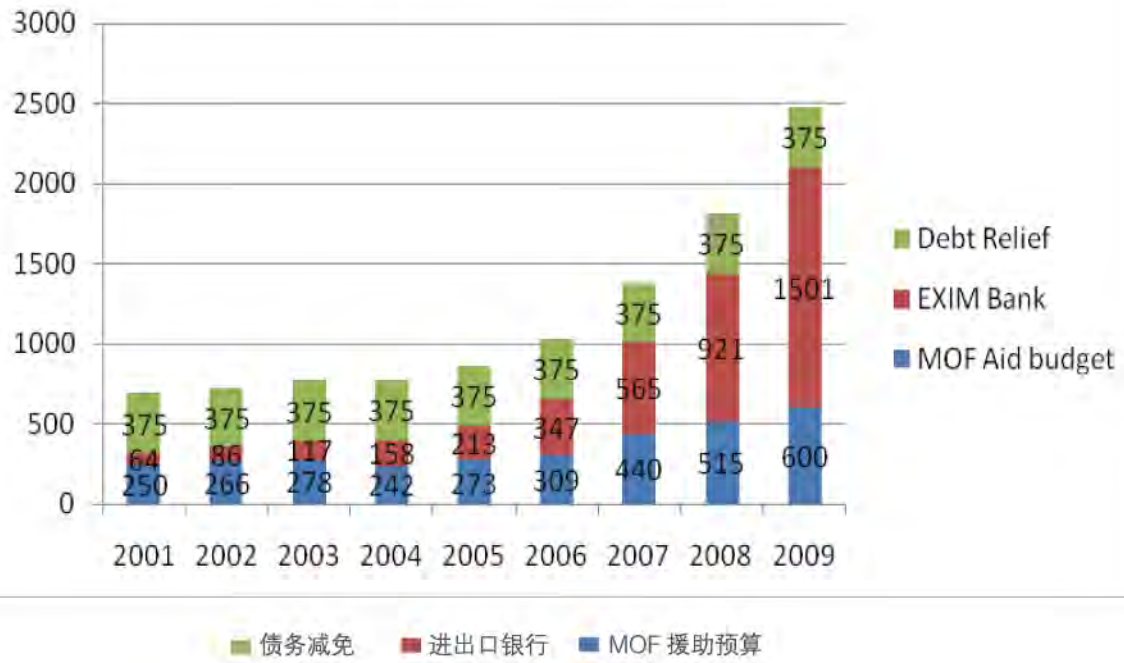
官方发展援助的定义。中国不使用与 OECD 相同的定义。例如，中国外援包括优惠出口买方/卖方信贷，保证特惠贷款；并使用外援资金支持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企业间的合资企业。中国的一般对外援助还包括军事援助经费。然而依据 OECD 定义，官方发展援助（ODA）包括以下拨款或贷款：a) 由官方机构承担的拨款或贷款；b）视促进经济增长和福利为主要目标的拨款或贷款；c）特惠金融条件（贷款必须拥有至少 25% 赠与成分）。对外援助包括技术合作，但不包括用于军事目的的贷款和信贷发放。其他官方资金流（OOF）包括拥有少于 25% 赠与成分的非优惠贷款。（关于 OECD 定义，详见 http://www.oecd.org/document/32/）

《龙的礼物》这本书具有划时代意义，其中戴博拉·布罗蒂格姆教授提供了一个有效方法来估算中国对非援助。她的结论是中国在 2007 年承诺了对非提供 14 亿美元的官方发展援助（包括减免债务），2009 年承诺援助高达近 25 亿美元（第 168 页，Brautigam2009 年）。作者的估算基于三项信息：财政部对外援助经费、中国进出口银行特惠贷款，和减免债务。第一部分来自《中国统计年鉴》。特惠贷款基于中国进出口银行至 2001 年年报，利用 35% 的增长率进行预测。在此基础上她还加上了 2001 年至 2008 年 4.5 亿美元债务减免平均额。这将使中国 2007 年对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总额高达约 30 亿美元（包括减免债务）。

中国对非洲官方援助数额

基于对中国官员进行的采访，她在第二步作出了这样一种假设，即中国对非援助占总额的比重从 30% 上升至 44%——预计 2006 年高达 3.09 亿美元。她假定进出口银行对非洲发放 50% 的特惠贷款。最后，中国还承诺取消非洲各国 2001 年至 2008 年高达 30 亿美元的债务，这表明每年平均减免 3.75 亿美元债务（中国对非实行 80% 的债务减免）。第三步，她对中国对非发展援助不同部分的增长率作出假设。首先，她假设中国实现了其承诺：2009 年将对非的官方援助在 2006 年的基础上增加一倍，达到 6 亿美元。第二，中国政府承诺了在 2007 年至 2009 年对非提供 30 亿美元的特惠贷款。她假定用三年时间对该项承诺贷款额进行分配。最后，她假定中国将继续以每年相同比率减免债务，延至 2009 年底。图 2 显示了其估算的结果。

图 2 中国对非洲年援助额（以百万美元估算）



资料来源：戴博拉·布罗蒂格姆，2009 年。《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牛津大学出版社。第 170 页。

中国对非援助如何与现有援助国进行对比？如上所述，中国在 2007 年承诺了对非提供 14 亿美元的官方发展援助（包括减免债务），这项援助小于现有援助国的援助数额，例如美国（76 亿美元）、欧盟（54 亿美元）、法国（49 亿美元）、英国（28 亿美元）、日本（27 亿美元）以及德国（25 亿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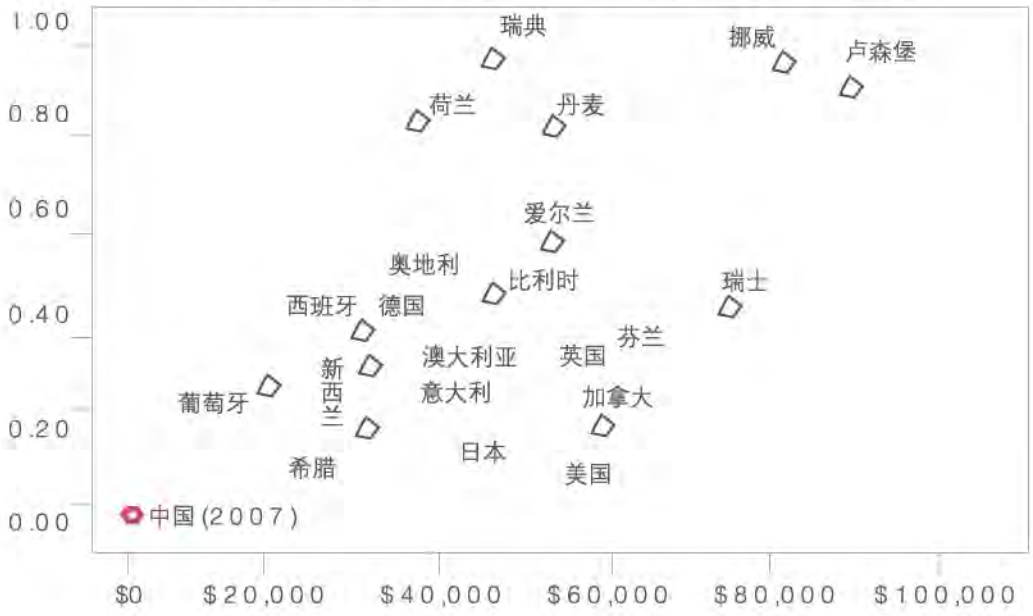
尽管中国对外援助 2009 年很可能比 2006 年翻一番，但中国领导人已承诺未来三年提供更多援助（在 2009 年 11 月第四届中非合作论坛上作出承诺），但与现有的援助国相比，援助金额仍相对较小。（第 172 页，布罗蒂格姆，2009 年）

基于中国将援助、贸易和投资相结合的做法，布罗蒂格姆估算了其他资金流（OOF），涵盖了 ODA、官方出口信贷及其他官方资金、私人银行贷款和非银行出口信贷作出的承诺，进一步作同类型比较。结果证实了中国是非洲一个强大的投资国：在与非洲的双边关系中，中国在美国和德国之后，位居第三。（同上，第 183 页）

跨国比较：我们为此综合报告专门整理了一组数据：计算了中国的官方发展援助 ODA 占 GNI 的百分比，与 OECD 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 ODA 与 GNI 的比重相比。下列图表说明了中国在人均收入相对较低时，便开始了对其它发展中国家进行援助。使用 Braudigam 的估算值（30 亿美元）作为 2007 年 ODA 的总数，中国发展援助占其 GNI 的 0.09%，正如预期所言，这比所有 OECD 成员国都要低。然而，如果在这个分布图上划一条线性回归线，中国正好处于回归线的上方，这表明中国就其人均收入水平而言为发展合作做出了较重要的贡献。如果使用的是官方总流量（ODA+OOF），2007 年，中国发展援助占其 GNI 的 0.18%（Yan Wang）。希望未来中国这一比例将有所增加。

图 3 ODA 占 GNI 百分比和人均 GNI 的对比

中国与现有援助国的 ODA（占 GNI 的百分比）和人均 GNI 的对比图



注释：X 轴表示人均 GNI（美元），Y 轴表示 ODA 占 GNI 百分比（%）。对于 OECD DAC 的成员来说，数据来自 OECD-DAC 数据库 2007 年的数据，该数据可从 http://www.oecd.org/dac/stats/idsonline 中查询到。中国 GNI 和人口的数据来源于 2008 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官方发展流动量（ODA）总量出自 Brautigam 2009，第 168 页。本专栏来源：Yan Wang（即将完成）

中国拥有好几种提供援助的机制，这些机制不同于已往的捐助国的原因之一是中国没有非政府组织机构、教堂、私人顾问及具体执行机构。其另一特点是，对交钥匙工程的过度使用——基于非洲国家的要求，将交钥匙工程用做为实物援助。在接到一个项目建设请求后，对其进行需求评估并开始进行国内招标。在确定合同方后，合同方需在财务预算和规定时间范围内完成项目，该项目的费用由中国各部委以人民币（RMB）的货币方式进行支付，后续则交由非洲政府运行。诚然，这是一种限制性援助形式，但这种合同关系确实降低了交易成本，并降低资金流失和被滥用的可能性。（李晓云 2009）

第五，有多方参与者参与中国对非洲的合作项目，包括政策性银行、省级政府、大型国有公司、商业银行和私有中小型企业（SMEs）。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与非洲的合作关系也是一种“多方对多方”的合作关系。每个合作方的表现都不尽相同。非洲参与方发现大型国有企业比私有中小型企业在遵循法律方面做得更好。中非两方政府都需加强针对援助项目承包商的法令法规。在最近的中非合作论坛上，中国政府做出承诺，要求中方公司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并与当地人民友好共处。然而，政府将采取何种措施实现这一目标，人们还拭目以待。

第六，中国已开始在非洲出资建造联合工业区，如赞比亚的谦比西工业区，毛里求斯的 Terre Riche 工业区以及尼日利亚的拉各斯莱基工业区。依据“雁阵”模式（flying geese），这些工业区希望能吸引大量中国和其他各国的不同行业的企业（Akamatsu 1962，Kojima 2000）。起初，日本在产业转移，领导东亚国家进行地域一体化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1985 广场协议之后，日本企业开始寻求新的海外投资地点实行产业转移。东亚新兴工业经济体则紧随日本之后，跨国开展各种产业活动。生产网络首先在日本、韩国和台湾（中国）建立，随后，逐渐转移到马来西亚、泰国和随后崛起的中国和越南。与之类似的是，几个产业集群已在非洲开始建立。然而，认为在这些地区生产这些产品的成本一定会比亚洲便宜是不一定现实的。必须制定相应的政策体制和规则制度，鼓励公司进行技术转移，提供培训以帮助建立本地生产能力。

诚然，在发展过程中中国远非完美无缺，毫无差错，也需要从中吸取正面和负面的经验教训：中国对工业化的大力推动与农村-城市收入差异扩大和环境恶化密切相关。早在 2007 年 3 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就指出：中国的发展是失衡的，不公正的及不可持续的。政府已强调建设一个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必要性，从对工业化的关注转移到对服务部门的关注，从对增长速度的单一关注到对增长质量的关注。在这次全球经济危机中，出口需求急速下降，中国被迫“重新平衡”其增长模式，减少其对出口和投资的依赖，更多鼓励国内消费、促进社会服务和环境可持续发展。这个趋势将影响中国发展合作活动分部门的构成，这在中国于 2009 年 11 月对非洲承诺的八项措施中有所体现，这些新的举措包括应对气候变化的举措，加强在减贫，能力建设，社会服务，企业社会责任等方面的合作等。

3.3 非洲和捐助国的观点：哪些合作卓有实效，哪些没有实效？

非方提出其观点的基础是 2009 年 10 月 20 日召开的四国远程研讨会。与会者强调中国参与非洲发展的重要性，包括向非方提供了新的选择和杠杆。他们欢迎中国对非洲发展一贯的支持，并留意到其贸易和投资对非洲增长有重大贡献。与会者欢迎中国关注非洲的基础设施和投资，这将帮助非洲建立更长期发展的基础。有的评论员也暗示了中国对非援助的方式有助于使受援国“拥有主导权并自力更生”（Manji 2009，第七页）。许多与会者认为中国在非洲应同样考虑跨国、跨区域范围的投资（ACET 2009）。

与会者欢迎中非两方继续进行知识和学术交流，特别是在技术转让领域。许多与会者对政府资助的商业交易的条款和中国发展合作活动中缺乏透明度的现象感到无奈，并要求与现有援助更好的协调，使援助具有更好的预测性和更稳定的援助来源。与会者就“捆绑性援助”和当地雇佣机会提出问题，希望中国企业可以雇佣更多本地的公司和员工，并帮助其增强工作能力。与会者还就中国产品和服务的质量、环境标准，以及中国市场准入提出问题。然而，与会者也意识到中方必须克服语言障碍，平衡创造当地工作机会目标与在规定时间和预算范围内完成合同之间的关系（ACET 2009）。

总之，非方与会者认为中非是关键的战略伙伴关系，通过知识交流可以让彼此学到更多。然而，相对 OECD-DAC 的捐助国而言，中国的援助数量仍较少。可能因中国援助活动中缺乏透明度，存在对其有不切实际的过高期望。但是，其最终发展的责任仍落在非洲自己身上。好几个非方评论员都暗示“非洲必须自己掌握自己的未来”。

现有捐助机构的代表们总体来说对作为捐助国的中国表示欢迎。与会的捐助国承认并接受中国自己的、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捐助途径和方式。然而，他们也承认因中国在非洲的发展合作活动导致各个利益相关方都需要做出相应调整。他们也就其关心的话题提出了自己的问题。

多年来，捐助国 / 机构试图通过加大透明度、更好地提供信息共享和不断增进合作来协调发展援助活动。例如，早在 1969 年 OECD 就在官方发展援助的定义方面达成了一项国际共识（OECD-DAC 1969）。通过 DAC 的会员讨论，捐助国同意对其发展和合作活动及时分享其按国际标准统计的可比数据。有证据表明对发展援助进行协调使之合理配置是可实现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非洲国家已经或正在建立协调发展援助的机制。（Jacquet，AfD 和 OECD）。中国和其他非 DAC 捐助国可以参与在具体国家的捐助国协调论坛，帮助减少发展援助的交易成本、降低误解的可能性及捐助国竞争的风险性，提升受援国的发展速度。

第二，从国际社会的角度来讲，中国在对外援助的许多做法与国际上现行的协议和惯例并不一致，其大部分援助为双边的，捆绑性的援助（Brautigam 2009）。研究表明，捆绑性的援助使得援助对受援国的实际价值减少 10-15%，还有援助政策被大型跨国公司的利益所“俘获”的风险。另外，中国常与非洲中央政府打交道，而与当地社区接触有限。在过去几十年来，一些 DAC 国家已建立从中央到基层的多层次联系。中国可以从捐助国那里学习该种方式。在这方面，中国和捐助国之间能建立一种互补关系。

第三，中国发展合作经常利用项目援助形式，但这种方式有利有弊。一方面，项目援助与中国的比较优势休戚相关，中国在设计和建设大型基建项目，如铁路、公路、桥梁和海港方面有丰富的经验。但是这种援助“硬件”方式与同时需要“硬件”和“软件”

的非洲人民的需求不完全相符，这一点已得到在非的中国投资者越来越多的承认。而预算支持这种方式有利于促进受援国的主导权，减少援助的分割/不完整性。另一方面，项目援助有将发展援助与具体结果联系起来的优点，更容易对其进行监控和评价。例如 JICA 对许多基建项目进行了资助——非洲的主要经济走廊和能源部门，以及减贫和人道援助项目（JICA），另外，欧盟对基础设施也进行了资助。（Peter Craig-McQuaide）。在这些项目中，委托人和代理商各自的职责很明确——受援国政府是委托人，捐助人 / 承包商是代理商。由此减低了委托和代理职责混淆的可能性。

第四，需要一种新型的合作伙伴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中国、现有捐助国和非洲国家及所有利益相关方都是平等以待，每个合作方都对各方在目标、理念和方式上保持开放的态度。诚然，每个国家都有其地缘政治利益需要考虑，而援助则是达到该目标的手段之一。例如，OECD-DAC 国家寻求的是其同盟和稳定的国家；中国正寻求双方互惠的经济发展及和平的外部环境；非洲试图寻求在增长和减贫方面对其资源进行最佳利用（P.White），并最终能自给自足。因此，发展合作关系是建立在“多元化和互补性”的原则上（I.Ohno）。如果所有捐助国都意见统一，那么发展中国家如何选择和整合这些理念？因此，一种新型的合作关系应更能容忍不同的观点和途径，客户国便可以对这些理念进行选择和整合。

四、政策选择

在这次发展合作会议上，中国在非洲日益深入的经济活动受到许多非洲与会者的普遍欢迎。他们注意到中国的援助、贸易和投资活动对促进非洲的发展和减贫有所帮助。此外，中国作为非洲发展的新兴的主要参与方之一给非洲各国提供了一个选择机会。然而，中国可能从自身丰富的管理发展合作的经验中更好地学习借鉴，以便为其在非洲的发展援助活动提供参考。

做为一个负责任的全球合作伙伴，中国将愿意且已经开始积极参加现有的国际援助社区，通过对话、理解和合作（包括几次三方合作：涉及 FAO、IFC、WB、UK 的农业合作，及与 USAID 利比里亚的大学里建造中国援助的实验室（P. White））。提高援助的有效性和避免重复犯错符合各方利益。现今的改革体现在《巴黎宣言》和《阿克拉行动日程》中，旨在通过完善协调机制，提高透明度与预见性来提高援助的有效性。中方已签署巴黎宣言并接受其条款。可以考虑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 OECD-DAC 及其常规会议，以便中国能分享其发展经验，有更多的机会影响辩论，并分享其信息和数据。最终，非洲利益相关方、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也应参与到规则制定的过程中。

因此，下列关于政策选择的讨论是基于中国过去 30 年的经验，这与巴黎宣言的五大支柱大致一致，但又有所超越、深化。

1. 受援国对发展议程的主导和所有

非洲国家的领导力是非洲有效发展合作伙伴关系的主要因素。如果非洲国家希望同中国一样拥有更为充分的主导控制权，则还需实现更高水平的自主和问责。为达此目标，非洲国家需进行人力和体制能力建设，以便界定、领导和执行自身的发展进程。较高水平的自主不仅包括对发展的承诺（承担义务），提供指导路线（发展计划、减贫战略）还包括指导捐助国，并落实所做的承诺（结果）。当受援国政府掌握发展日程时，可促进捐助国之间的协调。

为使非洲国家在发展合作关系上能够充分掌有自决权，关键是让他们掌握更为全面的信息，了解援助的水平、条件，以及各发展伙伴提供的各种基于商业原则的交易的实质。为了让非洲国家掌握自主权“当好发展事业的司机”，“他们需要明确的目标、路线图，以及必要的掌控技巧和经验。”中国及其他新兴捐助国应考虑分享他们援助计划、数额和分配、条款和条件、评估结果，以及从多年参与非洲项目中得到的经验和教训，以便他人不会重复过去的错误。

现有主要捐助国应保持开放的态度，因为中国和其他新兴捐助国能提供一些其他可行模式。根据中国、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经验，国家的发展多数为内源驱动。给援助附加条件并不适用于中国。给援助附加条件（conditionality）是否与“受援国主导”(ownership) 的原则相一致？该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思考。

2. 发展援助的调整和契合

捐助国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有义务以互补的方式共同合作（巴黎宣言第 33、34、35 条）。非洲国家可根据各国的比较优势来考虑选择捐助国，以明确分工的方式进行任务分配。通过这种方式，捐助国以互补的方式进行合作，建立三方互惠互利共赢的局面。

根据中国的经验，政府应通过经常举行合作伙伴磋商会议引导对捐助国进行协调和领导，促进所有发展合作伙伴的信息共享和经验交流。在这方面，中国已经或正在通过参与具体国家内捐助机构小组会议，逐步参与协调。

非洲国家既需要“硬件“，也需要“软件”；在这方面协调合作会带来丰硕回报。中国的市场制度还很年青，仍不完善，法律和法规实施机制偏弱。2001 年中国加入WTO后，重新修制定多达一千条法律法规，使中国法律体系符合 WTO 的基本原则。在法律和制度改革后，中国经济得到了更快的发展。因此，尽管中国在学习国际游戏规则，但仍需要进行有关发展援助政策和法规的现代化、规范化。与主要捐助国交流知识和经验可加快学习速度。

3. 援助的实施和成果管理

主要捐助国可在项目实施进度和效率，将援助、贸易和投资有效结合等方面向中国吸取经验。国际援助金额与外商直接投资相比相对较小。使贸易、援助和投资相结合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 (PPP) 值得重新探讨。中国就其本身而言可加强监测、评价和影响的评估，促进学习过去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

国际捐助国曾大力投资中国的农业、能源、基础设施及其他生产领域。非洲的生产部门需要同样的援助，但近几年来这方面的援助呈下降趋势。面对未来，所有捐助国需要共同合作，加强对非洲基础设施和生产部门的援助。

中国是非捆绑型援助的受惠国，因为多边发展机构从不实行捆绑性援助，几乎所有双边援助国在 2000 年之后减少或取消了捆绑性援助。1984 年，世界银行在中国大型项目中引进了国际竞争性招标（ICB），随后，中国政府采用了国际竞争性招标和其他采购规则作为国家标准。《阿克拉行动日程》（2008）明确要求，捆绑性援助比例下降是一种明显的国际趋势。新兴捐助国也应考虑跟随这种国际趋势。

4. 效果的评估和共同责任

非洲政府和人民肩负着其发展的最终责任，应该掌握自己的命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加强也是加快非洲大陆发展的重要因素。领导力的提升能帮助非洲国家充实区域基础设施发展战略，更好地利用中国和现有捐助国提供的机会。

学习和借鉴经验需要可靠的信息和评估。合作伙伴共同承担责任也需要对援助项目进行评估（M&E）和（长期）影响评价 (impact assessment)。但是，主要和新兴捐助国对发展项目的评估研究和影响评价的研究数量不足。这些信息对于增进发展援助的有效性，促进非洲经济增长和减贫具有重要的价值。所有发展合作伙伴分享这些评估信息可推进发展援助有效成果的取得。

下表列出了一些转变发展合作关系的方面和事例，由所有合作方进行讨论（表 1）。此表只起说明作用。

表 1 经验借鉴和发展合作转变方式

过去：借鉴中国过去三十年发展经验	是否与《巴黎宣言》和《阿克拉行动日程》（2008）相一致？	将来：对在非洲发展合作伙伴的启示
中国采用自主发展模式，在这种模式下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引导并承担发展的最终责任。其“五年计划”进程中，包括发展伙伴在内的所有部委和地方部门开展全国协商会议	与“受援国主导”即第一支柱内容相符	非洲国家需要采取更高层次的自主。发展合作方可参与非洲国家减贫战略（PRS）或发展计划，提供数据、信息及建议，以便非洲国家能够全面掌握援助金额、条件及分配情况
中国采用借鉴和创新的模式，借鉴发展合作伙伴经验，并坚持“适应自身条件”的原则	与第二支柱内容相符，发展援助要与国家发展战略相契合	将援助项目同国家发展计划或减贫战略相结合
中国政府通过定期举行多边和双边捐助国协商会议来引导捐助国间的协调	与第三支柱内容相符，协调和避免重复	定期共同举行所有利益相关者协商会议，包括国家多边和双边捐助方
中国坚持捐助国或投资国与地方合作伙伴和项目经理合作，进行学习和能力建设	与第四支柱内容相符，成果管理	与地方政府、项目管理人员和地方合作人密切合作；转让技术并进行地方能力建设。最后采用国家自身体制进行管理
中国过去受益于国际竞争性投标（由于多边机构的努力）和捆绑性援助比例下降（由于双边援助国的努力）	《阿克拉行动日程》呼吁减少捆绑性援助，与第四支柱内容相符	所有发展合作方减少捆绑性援助的比例，尤其在采掘业，使用国际竞争性投标
中国在自身发展中采用实验评估，若实验成功，则扩大使用范围，避免失误	第五节——共同承担责任	鼓励进行并改善监管、评估以及影响评价的研究，为所有合作方借鉴经验提供可靠信息

资料来源：中国–DAC研究小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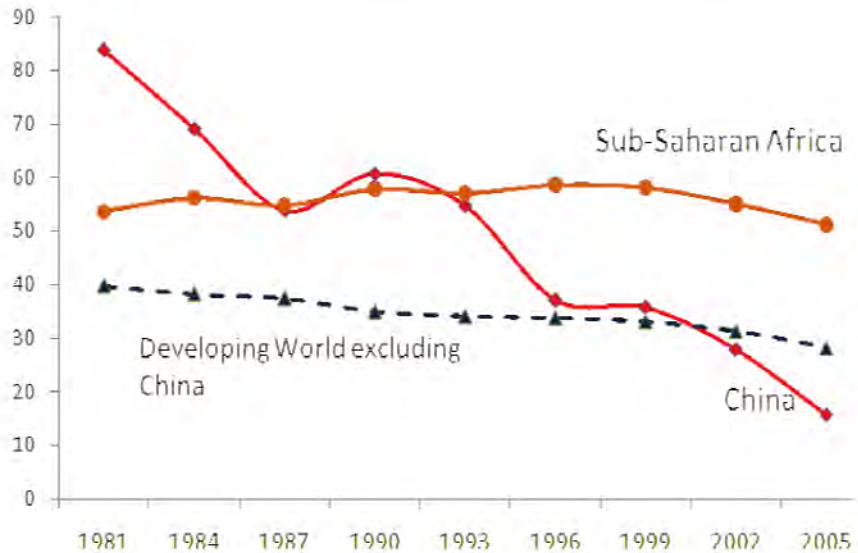
未来应建立中国和国际发展援助团体间的定期对话、交流及合作机制。需要进行更为广泛的国际讨论，以便建立新规则和标准，实行发展援助框架改革。中国和所有新兴援助国以及所有发展合作伙伴均应参与规则的制定过程。现有的和新兴的援助国之间，应建立更多共同交流借鉴经验的机会，如中国-DAC研究小组就是范例之一。今后还可考虑进行共同/联合评估。相互借鉴也意味着现有的和新兴的捐助国之间倾听彼此意见，进行自我调整、转变和现代化，制定新的游戏规则，采取新的标准。所有合作方均应参与其中。

世界上饥饿贫困的人民再也无力承担无效援助产生的严重后果。因此，国际社会还需共同努力，以应对减少贫困、消除饥饿和促进增长等一系列重大挑战，以及在气候变化和流行性疾病等因素影响下而变得更为严峻的问题。中国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非洲本土人才可作出更多努力，将自身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国际社会欢迎并支持非洲国家在发展进程中发挥更加强大的领导作用和自主能力，从而通过更加强有力的增长和减贫国际合作，建设一个更加和平和繁荣的世界。

附录：中国经济增长和减贫效果：经验学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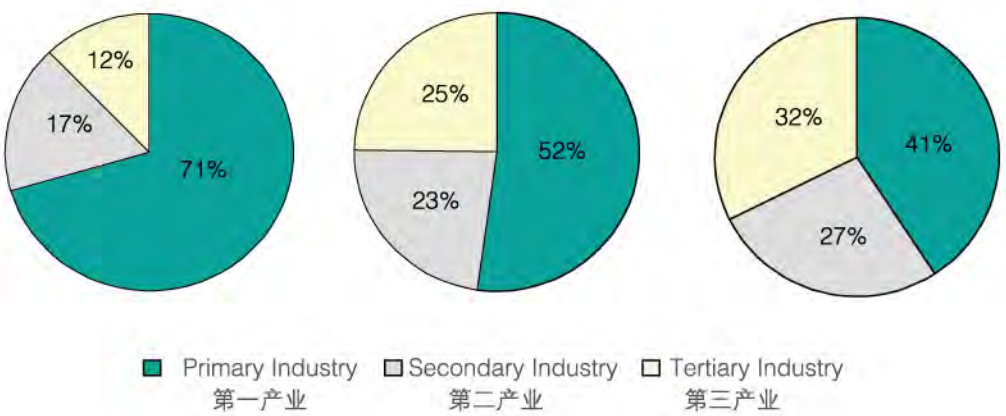
图 1：1981-2005 中国和非洲贫困发生率

生活 $1.25/ 天国际贫困线（2005PPP）以下人数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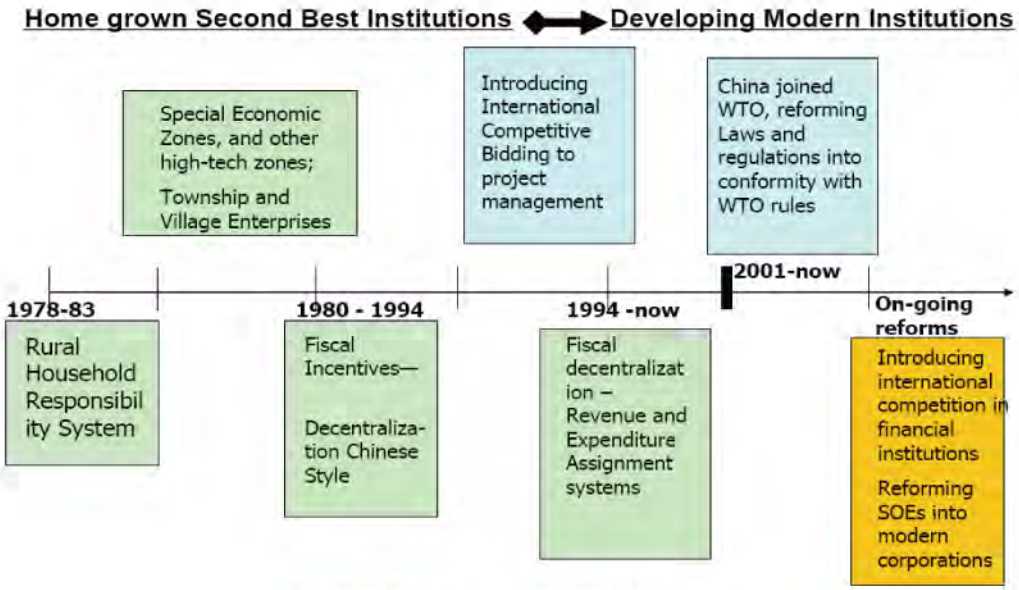
注：中国为农村和城市价格调整后的数据　资料来源：Chen and Ravallion (2008a，2008b)

图 2：中国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的巨大转变：三个部门就业比例



资料来源：Lin Yifu 和 Wang Yan2008。

图 3：体制建设：从基于本土的次优体制向现代体制的转变



本土的次优体制 → 建设现代体制

1978–83 年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1979–85 年经济特区和其他高新区；乡镇和村办企业的发展

1980 年 –1994 年 财政激励——中国式的分权方式

1984 年至今：将国际竞争性投标引入项目管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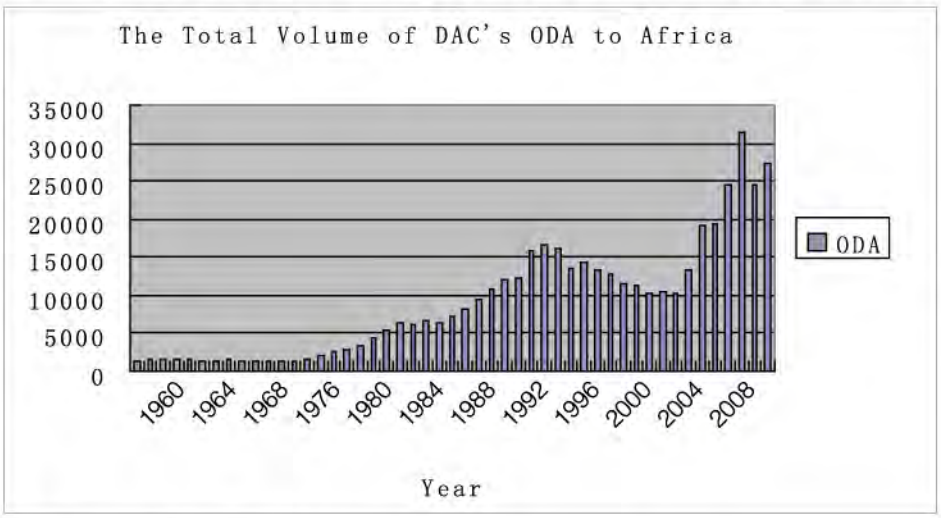
1994 年至今：财政分权——中央与地方财政税收支出分配制度

2001 年至今：中国加入 WTO 后，按 WTO 规则进行法律法规改革

2001 年至今：正在进行的改革：将国际竞争引入金融体系，将国有企业改革为现代股份制企业

资料来源：林毅夫和王燕（2008）。

图 4：发展援助委员会（OECD）成员国对非洲官方发展援助（ODA）总额（百万美元）



注：援助数额指以当时价格计算的政府发展援助支出。

资料来源：OECD 国际发展数据（IDS），来自 http://www.oecd.org/dataoecd/50/17/5037721.htm

部分参考书目

注：未发表的论文和与会者发言已在报告正文括号内标明报告人的名字

1. Acemoglu, D; S. Johnson, and J. Robinson. 2001.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 1369-1401.
2. Acemoglu, D; S. Johnson, and J. Robinson. 2001. " 比较发展的殖民起源 ".《美国经济评论》911369-1401.
3. Akamatsu, Kaname. 1962.—A Historical Pattern of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The Developing Economies, Tokyo, Preliminary Issue, No 1: 3-25.
4. Akamatsu, Kaname. 1962. " 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模式 ".《发展中经济体》，东京，首次发行 No.1:3-25.
5. Brautigam, Deborah. 2009. The Dragon' s Gift: The real story of China in Afric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6. Brautigam, Deborah. 2009.《龙的赋予：中国在非洲真实的故事》. 牛津大学出版社：美国 .
7. Broadman, Harry G. et al. 2007. Africa's Silk Road-China and India's New Economic Frontier,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8. Broadman, Harry G. 等 2007.《非洲的丝绸之路——中国和非洲新经济前沿》，世界银行，华盛顿 .
9. Burnside, C. and Dollar, D. 2000. "Aid, policies, and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 Burnside, C. and Dollar, D. 2000. " 外援、政策和增长 ".《美国经济评论》.
11. Chen, Shaohua and Martin Ravallion. 2008. "The Developing World Is Poorer Than We Thought, But No Less Successful in the Fight against Poverty".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4703.
12. Chen, Shaohua and Martin Ravallion. 2008. " 发展中国家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加贫穷，但在对抗贫困方面同样取得了成功 ".《世界银行政策研究工作报告 4703》.
13. Collier, Paul. 2007. The Bottom Billion: Why the Poorest Countries Are Failing and What Can be Done About I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4. Collier, Paul.2007.《最底层的十亿人：为什么最贫穷的国家会失败，应该采取何种措施应对》. 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 .
15. Collier, Paul. 2009. Wars, Guns, and Votes: Democracy in Dangerous Places.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16. Collier, Paul. 2009.《战争、枪炮和投票：危险地带的民主》. HarperCollins 出版社 .
17. Davies, Martyn, Hannah Edinger, Nastasya Tay and Sanusha Naidu. 2008. How China delivers development assistance to Africa, Centre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Stellenbosch.

18. Davies, Martyn, Hannah Edinger, Nastasya Tay and Sanusha Naidu. 2008.《中国如何为非洲提供发展援助》，斯坦陵布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

19. Dollar, David. 2008. Lessons from China for Africa.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Paper 4531.

20. Dollar, David. 2008.“非洲从中国吸取的教训”.《世界银行政策研究工作报告 4531》.

21. Doucouliagos, Chris, and Martin Paldam. 2009. —The Aid Effectiveness Literature: the SadResults of 40 Years of Research.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23(3):433-461.

22. Doucouliagos, Chris, and Martin Paldam. 2009.“外援有效性文献：令人遗憾的 40 年调研结果”.《经济调查期刊》，23（3）：433-461.

22. Easterly, William, and Tobias Pfutze. 2008. "Where does the money go? Best and worst practices in foreign aid". Brookings Working Paper.

23. Easterly, William, and Tobias Pfutze. 2008.“钱用在何处？外援的最佳与最差方法”.《布鲁斯金工作报告》.

24. Frot, Emmanuel and Javier Satntiso. 2009.—Crushed Aid: Fragmentation in Sectoral Aid, Stockholm Institute of Transition Economics (SITE) Working Paper No. 6, 2009.

25. Frot, Emmanuel and Javier Satntiso. 2009.“援助破裂：部门援助的分割”，《第 6 号斯德哥尔摩转型经济工作报告》，2009.

26. Gransow, Brittina, and Zhou Hong. 2009. —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Donors: Analysis of Development Management in China, background paper prepared for the China-DAC Study Group and presented on Oct 28-29 2009, and completed in January 2010.

27. Gransow, Brittina, and Zhou Hong. 2009.“中国和国际援助国：中国发展援助管理分析”，中国发展援助委员会研究小组背景报告，2009 年 10 月 28-29 日提出，2010 年 1 月完成.

28. Hausmann and Rodrik. 2003.—Economic Development as Self-Discovery.

29. Hausmann and Rodrik. 2003.“经济发展作为自我发现”.

30. He, Wenping. 2007.—The Balancing Act of China's Africa Policy,China Security Vol.3,No.3 Summer 2007.

31. He, Wenping. 2007.“中国对非政策平衡法”，《中国安全》，2007 年夏，第 3 卷第 3 号.

32. Kojima, Kiyoshi. 2000. —The Flying Geese Model of A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Origin,Theoretical Extensions, and Regional Policy Implications.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11: 375-401.

33. Kojima, Kiyoshi. 2000.“亚洲经济发展雁阵模式：起源、理论外延和区域政策含义”.《亚洲经济期刊》. 11375-401.

34. Li, Anshan. 2007. "China and Africa: Policies and Challenges". China Security Vol.3, No.3 Summer 2007.

35. Li, Anshan. 2007.“ 中国与非洲：政策和挑战 ”.《中国安全》2007 年夏，第 3 卷第 3 号 .

36. Li, Ruogu. 2009. 制度适宜与经济发展，李若谷 . 人民出版社 .

37. Li, Xiaoyun. 2009. China’ s Foreign Aid to Africa, IPRCC website.

38. Li, Xiaoyun. 2009.“ 中国对非援助 ”，中国扶贫中心网站 .

39. Li, Xiaoyun,Tang Lixia, and Wu Jin. eds. 2009. 国际发展援助概论。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40. Lieberthal, Kenneth. 2003. Governing China: From Revolution through Reform. (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 中文版 2010.

41. Lin, Justin Yifu, and Wang, Yan. 2008. "China ‘s Integration with the World: Development as a Process of Learning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4799. 林毅夫和王燕 . 2008.“ 中国与世界的融合：发展即学习和工业升级的过程 ”.《世界银行政策研究工作报告 4799》.

42. Lin, Justin Yifu. 2010.—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Paper 5179.

43. 林毅夫 . 2010.“ 新结构经济 ”.《世界银行政策研究工作报告 5179》.

44. Lu, You Jie and Wang Shou Qing. 2004. Project Management in China (中国的项目管理),Southeast Asia Construction, Issue Sept/Oct 2004, pp. 158-163.

45. Lu, You Jie and Wang Shou Qing. 2004.“ 中国的项目管理 ”,《东南亚建设》, 2004 年 9/10 月刊，pp.158-163.

46. Lum, Thomas, Hannah Fisher, Julissa Gomez-Granger, and Anne Leland, Feb 25, 2009. —China ‘s Foreign Aid Activities in Africa, Latin America, and Southeast Asia, R40361,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47. Lum, Thomas, Hannah Fisher, Julissa Gomez-Granger, and Anne Leland，2009 年 2 月 25 日 .“ 中国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东南亚的援助活动 ”，R40361, 华盛顿：美国国会研究处 .

48. Manji, Firoze and Sanusha Naidu. 2009.—The African Perspective on the Kinds of Development Partnerships China is forming in Afric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hina- DAC Study Group—Development Partnership for Growth and Poverty Reduction, October 28-29 2009.

49. Manji, Firoze and Sanusha Naidu. 2009.“ 非洲对中国对非发展合作关系的看法 ”. 为中国发展援助委员会《增长和减贫发展合作关系》准备的背景文章，2009 年 28-29.

50. Martens, B. et al. 2002. The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of foreign aid. Cambridge, U.K.: New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51. Martens, B. 等 2002.《对外援助的制度经济学》. 英国剑桥：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 .

52. McGillivray, Mark. 2003.—Aid Effectiveness and Selectivity: Integrating Multiple Objectivesinto Aid Allocations, WIDER Discussion Paper No. 2003/71.

53. McGillivray, Mark. 2003.“援助有效性和选择性：整合多重目标与援助的分配”,《联合国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院讨论报告》No.2003/71.

54. 4MOFCOM, (Ministry of Commerce)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2009. A 30-Year History On 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operation in China. 中国商务部 . 2009 年 .《中国发展援助合作的 30 年》.

55. NDRC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Department of Foreign Capital andOverseas Investment). 2009. 1979-2005 China' s Experience with the Utilization of Foreign Funds. Beijing: China Planning Press (in chinese). 国家发改委利用外资和海外投资司 . 2009 年 .《1979 年—2005 年中国外资利用经验》. 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中文版）.

56. OECD. 2005. Paris Declaration on Aid Effectiveness. Ownership, Harmonisation, Alignment, Results, and Mutual Accountability. OECD, Paris.

57. OECD. 2005.《巴黎有效援助宣言：自主、一致性、调整、结果和共同责任》. OECD，巴黎 .

58. Qi, Guoqian, 2007. —China' s foreign aid: policies, structure, practice, and trends, paper prepared for Oxford and Cornell universities 'conference on New directions in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xford, 11–12 June 2007.

59. Qi, Guoqian, 2007.“中国对外援助：政策、结构、实践和趋势”，牛津和康奈尔大学“发展援助新方向会议”报告，牛津，2007 年 6 月 11-12.

60. Ravallion, Martin, and Shaohua Chen. 2007. China' s (Uneven) Progress against Povert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82-1: 1-42.

61. Ravallion, Martin, and Shaohua Chen. 2007.“中国（不均衡）的减贫进展”.《发展经济学期刊》, 82-1：1-42.

62. Rodrik, Dani. 2007.One Economics, Many Recipes: Globalization,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Growt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New Jersey.

63. Rodrik, Dani. 2007.《同一种经济学下的很多不同处方：全球化、制度和经济增长》.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新泽西 .

64. Spence, Michael. 2008. —The Growth Report. The World Bank.

65. Spence, Michael. 2008.《经济增长报告》. 世界银行 .

66. Stiglitz, Joseph E. 1989, —Principal and agent, in J. Eatwell, M. Milgate and P. Newman (eds.), The New Palgrave. Allocation, Information and Markets. New York: W. W. Norton.

67. Stiglitz, Joseph E. 1989,“委托与代理”，J. Eatwell, M. Milgate and P. Newman（编辑）,《新帕尔格雷夫》.《分配、信息和市场》. 纽约：W. W. Norton.

68. Svensson, Jakob. 2006. —The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of Foreign Aid, Swedish Economic Policy Review 13: 115-137.

69. Svensson, Jakob. 2006." 对外援助的制度经济学 ",《瑞典经济政策评论》13：115-137.

70. Wang, Yan. 2005.—Development as a Process of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Lessons from China. in Moreno-Dodson, Blanca (ed.), Reducing Poverty on a Global Scale. Findings from the Shanghai Global Learning Initiative, Th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pp. 55-92.

71. 王燕 . 2005." 发展作为学习与创新的过程：中国发展经验 ". Moreno-Dodson, Blanca（编辑），《全球范围减贫：上海全球性学习倡议结果》，世界银行：华盛顿，pp.55-92.

72. Wang, Sangui, Zhou Li and Yanshun Ren. 2004. The 8-7 National Poverty Reduction. Program in China: the National Strategy and its Impact, Shanghai Global Poverty.Conference Case Study, World Bank Working Paper 30772.

73. Wang, Sangui, Zhou Li and Yanshun Ren. 2004." 中国 8-7 国家减贫项目：国家战略和影响 ",《世界银行工作报告 30772——上海全球贫困大会案例分析》.

74. World Bank. 2009. From Poor Areas to Poor People: China' s Evolving Poverty ReductionAgenda—An assessment of poverty and inequality in China. March 2009.

75. 世界银行 .2009.《从贫困地区到贫困人民：中国减贫日程的演变——中国贫困和不平等评估》.2009 年 3 月 .

76. World Bank. 2007. China and the World Bank: 25 years of Partnership and Innovation.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Washington DC.

77. 世界银行 . 2007.《中国与世界银行：25 年的合作关系和创新》. 世界银行出版社，华盛顿 .

78. Woods, Ngaire. 2008. "Whose aid? Whose influence? China, emerging donors and the silent revolution in development assistance". International Affairs 84: 6 (2008)1205–1221.

79. Woods, Ngaire. 2008." 谁的援助？谁的影响？中国、新兴捐助国和发展援助的无声变革 ".《国际事物》84:6（2008）1205-1221.

80. Zhou, Hong, Zhang Jun and Zhang Min. 2007. Donors in China.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Beijing.

81. Zhou, Hong, Zhang Jun and Zhang Min. 2007.《外援在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 .

2010年IPRCC研究报告系列之二

IPRCCWP1007 全球视角的环境与贫困

IPRCCWP1008 中国老年人福利研究

2010年IPRCC研究报告系列之三

IPRCCWP1009 增长与减贫发展合作

IPRCC

主　　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
主　　编：吴　忠
副 主 编：黄承伟
　　何晓军
　　程恩江
责任编辑：王小林

编　　辑：《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研究报告》编辑部
地　　址：北京市太阳宫北街1号
邮　　编：100028
电　　话：010-8441 9853
传　　真：010-8441 9658
电子邮箱：wangxiaolin@iprcc.org.cn
下载地址：http://www.iprcc.org.cn